

清末民初溫州瑞安下層士紳的閱讀生活 ——以《張桐日記》為例*

吳晶**

摘要

清末民初溫州瑞安下層士紳張桐（1860-1942）於光緒十四年（1888）開始撰寫日記，至民國三十一年（1942）止，為後世留下了前後跨越五十多年的日記記錄。近年來由其後人張鈞孫先生整理校對後出版，讀者遂得以一窺張桐的日記全貌。《張桐日記》的價值不僅在於其記錄時間之長，所涉及內容亦包羅萬象，涵蓋溫州政治、經濟、教育、實業、災荒、農田、民俗等諸多方面，是研究地方史的重要史料，也為瞭解近代下層士紳群體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新視角。

日記主張桐出身耕讀世家，早年間致力於科考，屢次不第後，遂決心以教職為業。自幼性喜閱讀的張桐，家中藏書頗豐，並且將個人的閱讀經歷詳記於日記當中。由於張桐日常以讀書為樂，故而閱讀活動不受時間空間所限，稍有閒暇即捧書閱讀，出門在外亦隨身攜帶讀物以備路途中閱讀。就《張桐日記》的內容加以爬梳，可以發現張桐閱讀種類廣泛，傳統士人必研讀之經史子集自不必說，且因身處新舊思想交織的時代中，是以新學/西學書籍、報刊雜誌亦有涉獵，此外還有鄉邦文獻、小說讀本等，從中可窺其廣博的閱讀生活。

關鍵詞：《張桐日記》、閱讀生活、下層士紳

* 本文為筆者碩士論文章節的一部分，承蒙指導教授蔣竹山老師及口試委員皮國立老師、羅士傑老師的指正與建議，特此致謝。

**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

一、前言



圖 1：浙江省地圖¹

張櫓（1860-1942），字震軒，號真俠，是清末民初之際生活在溫州瑞安（圖 1）的下層士紳，其先輩於南宋時期由閩地遷入瑞安，此後世代定居於此。張櫓父親張慶葵（1821-1891），原名張時葵，號心如。曾受地方鄉親之請督辦團練，協助平定金錢會之亂²。張櫓母親李太宜人出身廩生家庭，張父在原配妻子病亡後所續娶。張櫓一生在科舉道路上奮鬥三十餘年，屢試皆未能中榜，最終以捐稟貢告終，此後便執教為業。民國《瑞安縣誌》稱其「造就後進無慮數千人」。³張

¹ 圖片來源：<http://ditu.ps123.net/china/29.html>，引用日期 2021/07/30。

² 金錢會系由溫州府南部平陽縣錢倉江畔經營飯鋪的趙起所組，並於 1861 年與瑞安縣在籍京官孫鏘鳴（1817-1901 年）所組成的白布會之間發生武裝衝突。相關研究可參見：羅士傑，〈地方宗教傳統與「去中心化」的地方政治：重探溫州金錢會事件（1850-1862）〉，《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75（2012 年），頁 159-202。

³ 徐規，〈《張震軒選集》序〉，收錄於張鈞孫等編，《杜隱園詩文輯存》（香港：香港出版社，2005），頁 1。

櫚家中有田地數百畝佃租給農民，按季節向他們收取穀物、薯絲租、麥租等。作為地方士紳，張櫚亦積極參與瑞安地方事務的籌畫與建設，協助修築海塘、推動新式教育、調解鄰裡糾紛等，廣受當地鄉民的敬重，在當地社會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張櫚日記》始自清光緒十四年（1888），止於民國三十一年（1942），是一部長達半個世紀的日記巨著。所記內容都是作者親身經歷的日常見聞及個人感受，上至國家和地方之事，下至家庭瑣事，無所不記，涉及半個多世紀的社會變遷和日常生活，廣及此時期溫州所屬各縣之教育、經濟、民俗、藝文、名勝、人物以及軼聞等方面。歷史學家徐規（1920-2010）稱《張櫚日記》堪與趙鈞⁴（1786-1866）的《過來語》、劉紹寬⁵（1867-1942）的《厚莊日記》同為溫州近代三大日記。⁶由此可見《張櫚日記》對於近代溫州地方史研究的推進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張櫚的日記稿本在 1952 年由其四子張崑捐至溫州圖書館古籍部保存，並於近年由其嫡孫張鈞孫秉承保留手稿完整、尊重原著內容的原則，整理校對出版。讀者遂得以一窺日記全貌。

《張櫚日記》因時間橫跨之長、內容涵蓋之廣，自是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李萌從教育事業、公共事業的角度探討了張櫚作為地方士紳在近代地方社會事務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發揮的作用。⁷徐佳貴利用《張櫚日記》、《頗宜茨日記》等日記探討近代知識轉型的問題。⁸郭威廷對張櫚以調解人身份介入鄉鄰糾紛的實踐進行考察，分析非正式權力的士紳階層在社會調解系統中角色。⁹郝慧娜通過《張櫚日記》中的觀戲記錄為線索，對清末民初溫州地方演劇情況進行研究。¹⁰馮筱

⁴ 字石渠，號定齋，別號水竹居主人，庠生。歷任瑞安、上韓等地塾師。

⁵ 號厚莊。著名教育家、學者，溫州現代教育、地方文化事業先賢。著有《東瀛觀學記》、《民國平陽縣志》等。

⁶ 徐規，〈《張震軒選集》序〉，收錄於張鈞孫等編，《杜隱園詩文輯存》，頁 2。

⁷ 李萌，〈清末民初瑞安地方士紳與社會事業——以張櫚《杜隱園日記》為中心的探討〉，《湖南人文科技學院學報》卷 34 期 4（婁底：湖南人文科技學院學報，2017），頁 29-33、114；李萌，〈清末民初瑞安士紳與地方教育——以《張櫚日記》為視角〉，《遵義師範學院學報》，卷 19 期 3（貴州：遵義師範學院，2017），頁 37-40。

⁸ 徐佳貴，〈地方士人與晚清地方的下層「啟蒙」——以浙江省溫州府為例〉，《史林》，期 2（2018 年），頁 90-104、219。

⁹ 郭威廷著，張一民譯，〈爭訟人生：《張櫚日記（1888-1942）》所見清末民國時期地方社區調解人的生活〉，《法律史譯評》，卷 5 期 2（2013 年），頁 275-304。

¹⁰ 郝慧娜，〈從《杜隱園日記》看清代光、宣年間溫州戲曲演出之盛〉，《溫州大學學報》，卷 23 期 1（2010 年），頁 97-92；郝麗娜，〈清末民初溫州地方戲曲演出研究——以張櫚《杜隱園日記》為中心〉，溫州：溫州大學人文學院碩士論文，2010。

才運用《張櫚日記》從地方士紳的政治觀感出發，探討國民黨黨治在基層實際展開過程的情況與困境。¹¹李發根以日記中有關瑞安鄉村社會環境實態的記載，剖析浙江鄉村菁英的時代命運與他們視野中國民黨政權合法性的喪失。¹²

在日記中可以看到，出於消遣娛樂、修身養性、汲取新知等原因，閱讀佔據張櫚日常很大的比重。他習慣將所讀文本悉數記錄於日記當中，每當閱其感興趣之處則摘錄下來，並將當下心中所思所想書寫在日記裡。張櫚的閱讀實踐為學者探究近代新知舊學交織下知識分子的觀念世界提供了重要的線索。尤育號認為張櫚閱讀世界的變化是近代下層士紳完成自身出路的轉型與適應。¹³蔣建國從張櫚等人的閱報活動入手，剖析他們於國家時局動盪下觀念世界的變化過程。¹⁴卞冬磊從日記中發現，在甲午戰爭以前，張櫚的閱讀主要聚焦在前人的著作當中，缺乏對政治現實的關懷。¹⁵

綜上，現有關於《張櫚日記》的研究成果涵蓋了許多主題，涉及社會史、教育史、戲曲史、思想史、閱讀史等各個面向。張櫚的閱讀實踐也受到了學者的關注。但有關張櫚的閱讀習慣、閱讀種類尚未有文章詳述，仍有待深入探討。閱讀的過程是讀者與讀物建立互動關係的重要環節。《張櫚日記》中有關於私人閱讀長時段的詳細記載是我們瞭解清末民初溫州地方閱讀文化可資借鑒的材料。是以，本文聚焦於張櫚閱讀生活，包括閱讀時間、閱讀場所、閱讀方式、閱讀文本種類等，以期勾勒清末民初地方下層士紳這一特定讀者群體的閱讀景象。

二、閱讀時間

從張櫚日記中的記錄來看，其閱讀時間並不固定，就其對讀書的熱忱而言，只要是閒暇之餘，他便醉心於閱讀。民國十一年（1922）正月，此時任職於省立第十中學的張櫚接到訓育部教科鐘點單，得知授課時間被安排在禮拜三、四、五

¹¹ 馮筱才，〈「中山蟲」：國民黨黨治初期瑞安鄉紳張櫚的政治觀感〉，《社會科學研究》，期4（2015年），頁156-169。

¹² 李發根，〈近代鄉村社會環境變遷的鄉土敘事：浙南鄉紳張櫚的日常生活史考察〉，《中國農史》，期4（2019年），頁96-107。

¹³ 尤育號，〈在舊學與新知之間：一個鄉村士紳的閱讀世界——以張櫚《杜隱園日記》為中心〉，《歷史教學問題》，期4（2011年），頁93-100。

¹⁴ 蔣建國，〈二十世紀鄉紳的報刊閱讀與觀念世界——以張櫚、皮錫瑞、劉大鵬為例〉，《高校圖書館工作》，卷38期183（2018年），頁65-70。

¹⁵ 卞冬磊，〈「現實主義的匱乏」：甲午前夕中國讀書人的閱讀生活〉，《河南大學學報》，卷53期6（2013年），頁22-31。

此三日，他覺得無課的四天正好可以安排讀書閱文。¹⁶換而言之閱讀是張桐空閒時的首選活動。因此，在日記中可以發現，無論是早晨、午後或者晚間，均有閱讀相關之記錄。

所謂「一日之計在於晨」，早晨若無上堂授課、親友來訪，或其他待辦之事，張桐往往擇書一二以閱之。譬如，宣統二年（1910）六月十四日晨，張桐曬妻兄林駿的遺書，並看其中的《竹園類稿》、《太鶴山人文集》。¹⁷民國八年（1919）四月六日，張桐晨起吃過早飯後看《春聲》，並覺其「極有趣味」。¹⁸《春聲》乃近代文學家姚鵬雛（1892-1954）於1916年在上海創辦的小說月刊。民國十一年（1922）正月初一，新年伊始，張桐「晨起開筆，讀《大學》及朱子《大學章句序》」。¹⁹民國十九年（1930）九月廿一日，張桐「晨抄錄舊作詩稿，讀《黃帝內經》各論」。²⁰民國二十八年（1939）六月廿八日，張桐「晨讀《袁中郎書筍》，頗快爽有味」。²¹晨讀似乎是張桐日常作息表中固定的內容。

午後閑來無事，張桐更不會錯過享受閱讀的好時機。民國九年（1920）四月廿六日，天氣悶熱令人思睡，因下午不用上堂授課，張桐遂看《小說新報》以作消遣。²²《小說新報》是民國初年於上海刊行的鴛鴦蝴蝶派²³的重要刊物。民國十年（1921）六月廿六日，張桐午睡起來看《小說界》，並排棋譜。²⁴民國廿三年（1934）七月十四日，張桐午後閱《瘦梅香室詩》，評「詩甚流利，不墜四靈家法」。²⁵民國廿五年（1936）七月十八日，張桐午後看《十粒金丹》²⁶，認為「此書描寫忠臣義士、奸相刁徒，悲歡離合，淋漓盡致，可稱醒世一部好小說」。²⁷

¹⁶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六冊）》（北京：中華書局，2019），頁2531。

¹⁷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三冊）》，頁1286。

¹⁸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五冊）》，頁2185。

¹⁹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六冊）》，頁2526。

²⁰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八冊）》，頁3553。

²¹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九冊）》，頁4369。

²²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五冊）》，頁2316。

²³ 中國近代小說流派，始於20世紀初，盛行於辛亥革命後。文學主張是把文學作為遊戲、消遣的工具，以言情小說為骨幹，情調和風格偏於世俗。內容多寫才子佳人間的情愛故事，主要作家有包天笑、徐枕亞、周瘦鵑、李涵秋、李定夷等。

²⁴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五冊）》，頁2455。

²⁵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八冊）》，頁3897。

²⁶ 清康熙年間薊州人士蕭晶玉所著小說。該書講述的是北宋神宗年間，漁陽小燕山下的麒麟村高延贊一家人歷盡艱辛、屢遭磨難，最終團聚的故事，生動地塑造了女英雄高夢鸞出奇制勝、殺敵立功的形象。

²⁷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九冊）》，頁4047。

晚間坐於燈下閱讀，亦是張桐日常消遣之一。光緒三十二年（1906）八月廿二日，張桐「燈下閱《先正事略》及《續明史紀事本末》，至更餘始就枕。」²⁸民國十三年（1924）八月廿四日，張桐「晚看《明遺民詩》數首，以消岑寂。」²⁹一般而言，張桐閱讀至九、十點鐘即就寢，但有時也會因為所讀內容引人入勝，以致沉迷其中忘記時間。如光緒三十四年（1908）二月廿九日，張桐晚間讀《小說林》，又看《盜窟奇緣》一冊。因為「情節頗離奇可取，閱至十一點鐘始就枕。」³⁰而張桐閱讀的內容也成為了睡前講故事給子女孫兒聽的儲備。民國三年（1914）七月十一日，張桐「燈下說《天方夜譚》為諸兒女聽。」³¹民國廿三年（1934）九月十九日，張桐「燈下說《西遊》為稻、鐵兩孫聽。」³²又九月廿三日，張桐「燈下說《今古奇觀》第一回為諸孫聽。」³³

張桐對於閱讀的堅持與熱情，可謂無論陰晴冷暖，皆不廢讀。民國十年（1921）五月十六日，因連日霪雨不能外出，張桐在家看《宋詩鈔》。³⁴未過幾日又記：「下午因天氣酷熱，科頭赤腳高臥北窗而已。四句鐘為人書扇一柄。看《小說界》。」³⁵民國廿二年（1933）閏五月九日，雨勢巨大，一日一夜不曾停過，張桐遂看《春聲》雜誌消遣。³⁶民國廿七年（1938）二月六日，張桐提到昨夜至今早雷雨不停，天氣反復無常，氣溫忽高忽低。昨日還是悶熱，今日則驟涼，故在家讀《鮎埼記》。³⁷此書系清代史學家、文學家全祖望（1705-1755）所撰，其中有大量關於明清史事、掌故、人物的內容。

甚至是身體不適之時，閱讀亦成為張桐舒緩身心疲憊的方式，大概是因為恣意閱讀世界可以使他暫時忘卻身心不暢之感。民國四年（1915）七月十六日，張桐「早晨起以體太疲軟，故靜坐西樓看《隨園詩話》及王潛齋《經緯醫書》。」³⁸民國十一年（1922）正月十八日，張桐本來要赴溫州十中校長洪岷初家弔祭，但恰逢身體不適，又陰雨不停，便在家中讀明清詩人錢謙益（1582-1664）的作品集

²⁸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二冊）》，頁 901。

²⁹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六冊）》，頁 2818。

³⁰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三冊）》，頁 1062。

³¹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三冊）》，頁 1461。

³²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八冊）》，頁 3914。

³³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八冊）》，頁 3915。

³⁴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五冊）》，頁 2452。

³⁵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五冊）》，頁 2453。

³⁶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八冊）》，頁 3786。

³⁷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九冊）》，頁 4192。

³⁸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四冊）》，頁 1614。

《有學集》。³⁹民國十二年（1923）三月廿六日記：「在家養病，終日臥書齋藤榻，醒即看書以消遣而已。」⁴⁰民國二十年（1931）六月廿二日提到，徹夜肚子不適，早起腹中脹氣，依舊未舒暢，便看《寄園寄所寄》⁴¹數則消遣。⁴²

總體而言，張桐日常作息安排中，閱讀時間佔有很大的比重，早起、午後、晚間皆可閱讀，冷熱陰晴皆不影響其閱讀活動。通常來說，身體不適的情況下往往精神難以集中，但張桐依舊可閱讀以作消遣。其對閱讀的癡迷程度由此可見。

三、閱讀空間

（一）西書室

張桐日常在家中的閱讀場所主要以西書室（圖2）為主。這不僅是張桐的讀書空間，也是他放置藏書的空間。1927年9月，大概是天氣炎熱的緣故，西書室曾無端起火，所幸搶救及時，書籍幸無損毀，張桐還作詩一首以表慶倖。張桐時常在日記中提及在西書室中讀書。民國十三年（1924）二月十二日：「晨起寒甚，終日不得外出，在西書室看書，昏昏欲睡，只得排弈譜以得消閒。」⁴³民國十四年（1925）十一月八日：「晨起傷風漸愈，精神亦稍振，乃坐西書室讀《穀音》



³⁹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六冊）》，頁2530。

⁴⁰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六冊）》，頁2662。

⁴¹ 清代趙吉士（1628-1706）所編筆記，內容為作者所搜羅之古今異聞，涉及國家政事、道德倫理、天時輿地、山川名物、人物軼事、詩文紀事等，兼及神鬼怪異。

⁴²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八冊）》，頁3617。

⁴³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六冊）》，頁2765。

圖 2：1942 年秋 張桐的後人於西書室前合影

及《河汾集》諸詩。」⁴⁴民國二十年（1931）三月廿九日：「晨六句鐘起，盥洗畢，至西書室開卷點《公羊注疏》宣公、成公兩傳畢。」⁴⁵民國二十年（1931）二月十六日：「晨起因精神較昨略好，啜粥後，遂至西書室案上研朱點《左傳注疏》昭公元年至五年止。」⁴⁶

而對待書室裡的大量藏書，張桐自有他的收藏經驗要訣，即「書以時經手，澤時露風日，便不黴蛀，一味閉置，近年不翻閱，未能保其不蛀也。」⁴⁷書籍必要時常經手，不可長年閒置，方可不長黴斑，不被蟲蛀。正因為如此，張桐除了頻繁且廣泛地翻閱藏書外，每隔一段時間便會將西書室中的藏書搬出來清理晾曬。譬如，民國十三年（1924）十月十八日，張桐檢查西書室中兩個書櫥。雖然入夏之際已經命四子曬過書櫥中的書籍，但仍發現有蛀蟲破壞藏書，故急忙每本掃除並置於陽光底下曝曬。⁴⁸民國十九年（1930）五月八日提到：「昨將西書室東間下書篋舊書及各課本一律曬晾之，今日則旋晴旋陰，天時不定。」⁴⁹

張桐曾在日記中提到：「予聞友人自北京回者，均言北方地氣疏燥，藏書絕不見蠹，而我甌地甚卑濕，我鄉尤近海煮鹽，故二三月間黃梅雨盛，則黴濕益甚，此書之所以時時生蠹，屢除仍屢難淨。」⁵⁰正如其所言，瑞安氣候潮濕之故，加之張桐藏書量頗豐，若不時常檢之、曬之，很容易導致藏書損毀。民國廿二年（1933），張桐檢查歷年所記近百冊日記，就發現「漸患蠹蝕」，所幸發現及時，「即就旭日曝之」。⁵¹又民國廿一年（1932）九月十三日，張桐偶見西書室的書櫥之內有多張殘破的紙，料想是有老鼠跳入其中，遂檢點各書，幸而只有新購的《溫州經籍志》其中一冊略微破損，尚可修補。對此張桐感歎：「予平生愛惜書本如命，乃屢遭蠹蝕，又被鼠傷，何書神之不我佑耶。」⁵²由此可知，藏書並非一時一刻之功，除了經濟上的支出外，亦需要長年累月的投入時間與精力，若非嗜書

⁴⁴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六冊）》，頁 2997。

⁴⁵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八冊）》，頁 3599。

⁴⁶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八冊）》，頁 3590。

⁴⁷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六冊）》，頁 2579。

⁴⁸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六冊）》，頁 2836。

⁴⁹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八冊）》，頁 3515。

⁵⁰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八冊）》，頁 3514。

⁵¹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八冊）》，頁 3790。

⁵²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八冊）》，頁 3715。

如癡之人，萬難做到如張桐這般。

（二）書店

書店在張桐日常閱讀生活中，除了上一章節中談到為其提供購書、租書的渠道外，亦是其閱讀空間一部分，這也體現出了書店之於張桐閱讀世界的重要性。張桐在日記當中詳細記錄了他平常頻繁進出書店坐閱書籍、報刊的相關活動。光緒二十八年（1902）四月廿三日，張桐從友人家中出，便至簡玉書坊小坐，恰逢大雨傾盆，便在書坊中閱書以避雨。⁵³民國五年（1916）十二月十二日，張桐在維新書坊看《甌海潮週報》，認為此報一大缺點乃「內容無多材料，而板子模糊，讀者棘口。」⁵⁴此報是溫州的地方報，由梅冷生於1920年創辦。民國六年（1917）四月十五日，張桐晚飯後至維新書坊小坐並流覽新到《小說海》數冊。⁵⁵民國七年（1918）四月五日，張桐「四句鐘赴墨香簃閱《海山仙館叢書》⁵⁶殘本廿餘冊。」⁵⁷又過三日，張桐燈下赴墨香簃閱書，閱《兩當軒集》⁵⁸甚佳，只可惜缺少一冊。⁵⁹民國十年（1921）二月一日，張桐外出五馬街協興信局給女婿李公諒寄信，之後便至府前街日新書局坐看《越縵堂日記》。⁶⁰

而從其進出書店的時間來看，張桐尤喜於晚間赴書店閱書，這大概是出於飯後散步消食的緣故。民國十年（1921）二月三日晚，張桐至日新書坊看《官眷現形記》。⁶¹民國十二年（1923）八月廿三日晚，張桐赴日新書坊看小說家許指嚴（1875-1923）所著《都門豔史》。⁶²十一月十二日，張桐晚上赴商務書局觀《北史演義》，稱此書「極有趣味」。⁶³過三日，晚間張桐又赴商務書局看《元史演義》及《北史演義》，並言「讀之可以知二史大略」。⁶⁴十一月十九日，張桐赴商務書

⁵³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二冊）》，頁781。

⁵⁴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四冊）》，頁1864。

⁵⁵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四冊）》，頁1926。

⁵⁶ 清代潘仕成（1804-1873）所輯古籍。共收錄56種書籍，492卷，分為經史子集四部。

⁵⁷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五冊）》，頁2071。

⁵⁸ 清代詩人黃景仁（1749-1783）的作品集。其中有詩16卷，詞3卷，詩詞補遺及遺文3卷。

⁵⁹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五冊）》，頁2071。

⁶⁰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五冊）》，頁2412。《越縵堂日記》為清代詩人李慈銘（1830-1895）積累四十多年的日記，內容涵蓋咸豐至光緒年間的治學劄記、朝野見聞、人物評述、古物考據、書畫鑒賞、山川遊歷及各地風俗等，是張桐十分喜歡且反復翻閱的日記。

⁶¹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五冊）》，頁2413。

⁶²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六冊）》，頁2712。

⁶³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六冊）》，頁2737。

⁶⁴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六冊）》，頁2739。

局閱書直至十點鐘方回。⁶⁵民國十五年（1926）三月三日，晚上赴墾放局長林家婚宴，至九點半鐘酒席散後，張桐仍赴中華書局看《華園報》。⁶⁶

書店不僅是張桐閱讀消閒的空間，也是他和友人、學生閑敘暢談的場所。民國四年（1915）十二月八日，張桐於維新書坊遇老友王廷玉，兩人遂把袂坐談。⁶⁷民國五年（1916）六月五日，張桐晚間赴書局與友人老董閑敘，並將舊本《杜詩》五冊兌換《史記論文》二十冊、《讀書記數略》十冊。⁶⁸八月九日，張桐至維新書局，遇見谷棣甫於此處修書，兩人相談片刻。之後張桐又到日新書坊遇見項性初，與之共翻坊內各書。⁶⁹民國十二年（1923）二月十三日，張桐「晚赴府前日新書坊看《俠女恩仇記》，與朱廉青⁷⁰、楊志遠敘譚，九句鐘回校。」⁷¹五月十三日晚，張桐赴新新書局與師範學校的學生吳勃坐談片刻。⁷²張桐與諸好友可謂志趣相投，是以常常在書店相遇，或敘談片刻，或共閱書籍。

（三）任職學校內

光緒三十三年（1907）張桐任教於瑞安中學堂，次年轉任於郡中學堂（即溫州十中）。民國五年（1916）始，先後任職浙江省立第十師範學校、省立第十中學。民國十五年（1926）改在甌海公學任國文、歷史教席。至民國十六年（1927）退休賦閑在家。在學校任職期間，張桐除上堂授課、批改學生作業外，平日閒暇時間，亦是不綴閱讀。除校內書籍報刊外，張桐還會從家中攜帶書籍至學校閱覽，⁷³是以每逢學校放假之際，張桐都要檢點書籍行李，以作歸家準備。⁷⁴也因此任在教期間，學校教務室、藏書樓、圖書室、校舍等也成為其閱讀空間的一部分。

民國四年（1915）十二月九日，張桐晚飯後赴教務室看《申報》。⁷⁵民國五年

⁶⁵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六冊）》，頁2740。

⁶⁶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七冊）》，頁3037。

⁶⁷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四冊）》，頁1693。

⁶⁸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四冊）》，頁1779。

⁶⁹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四冊）》，頁1806。

⁷⁰ 商務印書館溫州分館經理。

⁷¹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六冊）》，頁2650。

⁷²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六冊）》，頁2680。

⁷³ 可參見民國五年（1916）三月廿四及民國六年（1917）三月廿九所記，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四冊）》，頁1744、1919。

⁷⁴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六冊）》，頁2734。

⁷⁵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四冊）》，頁1693。

(1916)三月十四日，張桐晨起在校看《春聲》，並覺頗有趣味。⁷⁶六月五日，張桐晨起在校看《清代野記》，並稱「是書頗多奇聞軼事，可資譚柄。」⁷⁷民國七年(1918)二月十七日，因午後有雨不得外出，張桐批改學生課卷後，在校舍看《文選》。⁷⁸民國十一年(1922)閏五月十九日，天氣炎熱，寒暑表已達百度，依張桐所言「赤日如火，行動則汗出如漿」，是以他只能躲在校室內看小說《七劍八俠》以消遣。⁷⁹民國十二年(1923)正月廿三日，張桐是日無需上堂授課，遂在校看《文學史》及《新古文辭類稿》。⁸⁰民國十五年(1926)三月卅日，午後張桐授課畢，即赴甌海公校藏書樓看書及閱讀近日《申報》。⁸¹甌海公校系由溫州蛟翔巷尾平水王廟改造，廟前的文閣則建為西式藏書樓，張桐曾贈存《百科全書》一百冊、《日本維新史》六冊於藏書樓為紀念。⁸²四月廿八日，張桐在校舍閱從籀園圖書館借回的《寒支集》。⁸³籀園圖書館即溫州市圖書館的前身，為紀念孫詒讓而建。

(四) 外出途中及目的地

張桐的閱讀活動不僅時間不固定，所處空間亦受限制。即便是出門遊玩、走親訪友，無論身處室內或戶外，其閱讀活動皆不因空間移動而減少。若有出門遠行，除隨身行李以外，張桐必攜帶書籍一路相伴。⁸⁴可以說，從張桐日記中的記錄來看，少見其無法閱讀的情況發生。

外出之時在交通工具上張桐仍抽空閱讀書籍以作消遣。光緒二十八年(1902)七月，張桐赴省科考，在快船上讀梁啟超(1873-1929)的《現今世界大勢論》及《滅國新法論》，並稱「痛切之談，石人淚下，任公真有心人哉。」⁸⁵光緒三十二年(1906)二月七日，張桐前往魚潭山拜謁祖先，在船上看天韻閣《李蘋香傳》，認為其詩、詞、尺牘均清麗可誦，傳之者不注姓名，大抵也是欣賞李蘋香⁸⁶(1880-?)

⁷⁶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四冊）》，頁1740。

⁷⁷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四冊）》，頁1779。

⁷⁸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五冊）》，頁2053。

⁷⁹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六冊）》，頁2576。

⁸⁰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六冊）》，頁2645。

⁸¹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六冊）》，頁3048。

⁸²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七冊）》，頁3035、3050-3051。

⁸³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七冊）》，頁3061。《寒支集》為明代福建寧化縣人李世雄(1602-1686)的作品集。

⁸⁴ 可參見民國廿六年(1937)三月二十及七月初八所記，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九冊）》，頁4093、4135。

⁸⁵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二冊）》，頁811。

⁸⁶ 原名黃碧漪，籍貫徽州，生於浙江嘉興。富有才情，惜家道中落，後因受騙誤入風塵。因擅寫

的才情。⁸⁷光緒三十三年（1907），張桐由瑞安中學堂返家的途中，在船上看《新封神傳》，言此書「嬉笑怒罵，巧不可階。」⁸⁸民國七年（1918）九月廿二日，張桐從姻親葉宅歸家途中，在船上看天虛我生⁸⁹（1879-？）所編《文苑導遊錄》六冊，稱此書「頗有益於初學」。⁹⁰民國十二年（1923）八月十二日，張桐乘船回汀田里前仍不忘先赴商務書局取《小說世界》七本，以便在輪船上閱讀。⁹¹

出於地緣之故，張桐跨出汀田里以外的空間移動，幾乎是以船代步。光緒二十四年（1898），甌海關建立，隨之而來的外國輪船和各航線的開通，極大便利了瑞安民眾的生活。有道是「汽笛鳴鳴曉聲寒，黑煙一終向空盤。永寧門外蓮橋畔，又有湖輪到瑞安」、「永瑞河輪兩度開，朝朝暮暮販鮮來。」⁹²這樣的變化也將張桐的活動範圍擴展到了汀田里乃至瑞安以外更廣的領域。因此張桐日記中記錄了頗多在船上閱讀的情況。而每至外出目的地，此處亦成為其閱讀活動進行的地點。民國十三年（1924）三月二十日，張桐攜兒子赴甌海漁潭村嶼山掃墓，留宿普照寺，次日晚間於寺樓讀《禮拜六》⁹³中的〈香草美人〉，情節頗有趣味，至九點半鐘即就寢。⁹⁴翌日下午，張桐在寺樓讀《列子》。⁹⁵民國廿二年（1933）七月，又赴漁潭村普照寺，在寺廟停留期間於靜室閱南宋洪邁（1123-1202）創作的志怪集《夷堅志》。⁹⁶民國廿六年（1937），赴南京遊玩之際，流連於太平路各書坊閱書，⁹⁷入夫子廟看書場休憩時亦取《光華本月刊》讀之。⁹⁸在南京期間如未外出，居於寓所則必閱書一番。

隨著子女婚配嫁娶，與姻親之間往來的同時也延伸了張桐的閱讀場所。以二

詩詞，出口成句，被文人雅客授以「詩妓」之譽。

⁸⁷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二冊）》，頁 846-847。

⁸⁸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二冊）》，頁 970。

⁸⁹ 天虛我生為筆名，原名陳栩，字栩園，號蝶生。自小性嗜文藝，生平寫詩幾千首，著譯小說百餘部，並旁及音樂、醫學等。民國初年鴛鴦蝴蝶派代表作家之一。著有《鴛鴦血》、《嬌櫻記》、《麗綃記》。《文苑導遊錄》是其主編的文學指南類刊物。

⁹⁰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五冊）》，頁 2122。

⁹¹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六冊）》，頁 2707。

⁹² 梅冷生撰，潘國存編，《溫州文獻叢書之梅冷生集》（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2006），頁 521。

⁹³ 1914 年在上海創刊的消閒刊物。因編者認為讀者惟禮拜六與禮拜日乃得閒暇而讀小說，故得此名。其中多是供給讀者在勞累一周之後放鬆身心，消磨時光的遊戲之作，體裁則兼收並蓄，以哀情及社會性質者居多數。

⁹⁴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六冊）》，頁 2776。

⁹⁵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六冊）》，頁 2776。

⁹⁶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八冊）》，頁 3804-3805。

⁹⁷ 可參見民國廿六年四月初二、初八、十五、廿四所記，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九冊）》，頁 4096、4098、4100、4105。

⁹⁸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九冊）》，頁 4100。

女兒所嫁南湖葉家為例。張桐與葉家之間交往頻繁，時常進出並留住於葉宅。與女婿葉墨山間的翁婿之交更是投契。民國廿三年（1934）正月廿六日，年僅四十九歲的葉墨山因病去世，張桐提及：「痛哉！惜哉！女兒及宗孫夫婦等抱屍大哭，真令人對之鼻酸。」⁹⁹盡顯悲痛之情。此後撰寫《哭婿》詩數餘章以表對葉婿的哀思。¹⁰⁰當張桐日常往來居於葉家期間，葉宅亦是張桐的閱讀空間之一。光緒三十二年（1906）九月一日，張桐留宿葉宅，燈下看《選報》數張。¹⁰¹次日，張桐與葉墨山暢談兼看《明史紀事本末》。¹⁰²光緒三十四年（1908）正月廿三日，張桐前去探望女兒女婿並留宿葉宅，次日晨在葉宅看《文明小史》。¹⁰³宣統二年（1910）十一月廿八日，張桐在葉宅同女婿看吉同鈞（1854-1936）所著《大清現行刑律講義》，稱此書「詳述古今中外刑律沿革源流，極翔實有法，誠肄法政者不可少之書也。」¹⁰⁴

當然這樣的情況不僅限於與葉家的往來，亦包括在其他宗族姻親之間的交往中，於此便不一一闡述。但可看出，張桐的閱讀地點所涉已然不拘於自家當中，而是延伸到了自家以外更為廣闊的空間。

四、閱讀方式

張桐雖然所涉略的讀物廣博繁雜，但閱讀的方式絲毫不因此而含糊隨意。閱讀過的書籍也不會就此置之一旁，而是反復翻閱，且時閱時新，每次都能有新的見解看法和心得體會。其讀書方法深受漢學傳統的影響，每讀一書，必先考辯其版本、作者、卷目和句讀。然後才對內容得失進行評駁闡釋。¹⁰⁵譬如，光緒三十四年（1908）六月廿八日，張桐讀明末清初散文家魏禧（1624-1681）所著《左傳經世鈔》。此書是清初評點《左傳》的代表作之一。張桐先從其校勘傳文著手，認為此書沒有跳脫出明人評書的習氣。又從其引證後世史事方面點評，言其雖偶

⁹⁹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九冊）》，頁 3851。

¹⁰⁰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九冊）》，頁 3853。

¹⁰¹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二冊）》，頁 902。《選報》是 1901 年於上海創刊的綜合文摘類報刊，於 1903 年停刊，創刊號由蔡元培（1868-1940）作序。以「開民智」為主旨，選錄各報新聞言論，間附評議。聲援愛國學潮，鼓吹變革，言論溫和。

¹⁰²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二冊）》，頁 902。

¹⁰³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三冊）》，頁 1053。《文明小史》為清代李伯元（1867-1906）所著小說讀本。以不同的人物故事，反映維新運動期間的中國社會現實。

¹⁰⁴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三冊）》，頁 1335。

¹⁰⁵ 尤育號，〈在舊學與新知之間：一個鄉村士紳的閱讀世界——以張桐《杜隱園日記》為中心〉，《歷史教學問題》，期 4（2011），頁 96。

有獨特的見解，但仍不如顧棟高（1679-1759）對於《左傳》的見解論述精闢卓越。¹⁰⁶

各書互相對比引證亦是張桐的閱讀方式之一。民國三年（1914）九月四日，張桐取《惜陰軒叢書》中所刊劉義慶（403-444）《世說新語》與乾隆年間刊訂的明人黃汝琳《世說新語補》相校對，發現兩書雖門類均同，但黃汝林版本則每個門類中皆或刪或補數則，與原版本存在較大差異。張桐認為這正是明代人喜好刪訂古人之書的陋習，並提醒讀者在閱讀之時不可不留心分辨，以不至被其誤導。¹⁰⁷民國四年（1915）九月六日，張桐讀夏燮（1800-1875）編著的明代編年史書《明通鑒》，稱此書「於明三蕃事實，頗能紀載簡要」，但還是遠不如徐鼎（1810-1862）《小腆紀年》對於南明史事記載之詳備。對此，張桐推測是因夏燮不曾讀過《小腆紀年》之故，是以未引用其中的內容。¹⁰⁸

張桐家中藏書經史子集大多點校批閱，治學態度求實嚴謹。如日記中載，民國七年（1918）十月六日，張桐晨起校對了清代古文家王拯（1815-1876）所編撰的《歸方評點史記合筆》。¹⁰⁹民國十六年（1927）五月十八日，張桐從晨起至晚間全日點校了清代散文家姚鼐（1732-1815）所選編的文集《古文辭類纂》第五十三卷至六十三卷。¹¹⁰民國十八年（1929）四月六日，晨起張桐點校了《毛詩注疏》兼《周禮注疏》，並閱孫詒讓所撰《周禮正義》。¹¹¹民國二十年（1931）三月一日，午後張桐點校《谷梁注疏》，並以《注疏考證》互相比對校勘。¹¹²六月十一日，晨起張桐點校家藏《李月槎詩集》，發現與從梅冷生處借得的《李月槎詩集》又多有不同處，便著手抄錄補充，以完善家中的藏本。¹¹³

張桐自言「束髮讀書，即喜閱史，而尤酷好太史公書」，尤其在研讀《史記》之上最是費心。張桐將各評本互相校勘後，「始覺諸家讀史，句讀均有不同，頗

¹⁰⁶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三冊）》，頁 1090。

¹⁰⁷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三冊）》，頁 1480。

¹⁰⁸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三冊）》，頁 1637。

¹⁰⁹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五冊）》，頁 2125。此書系統地綜合了明代散文家歸有光（1507-1571）、清代文學家方苞（1668-1749）對於《史記》的圈點、評論、注疏以及考據等，並提出王拯自己對《史記》敘事手法、結構安排、藝術特色、語言表達等方面的研究心得。

¹¹⁰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七冊）》，頁 3194。

¹¹¹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七冊）》，頁 3409。

¹¹²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八冊）》，頁 3596。

¹¹³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八冊）》，頁 3614。

滋疑義。於是以別紙逐錄，凡句之為點為讀，或連上或屬下者，詳為羅列，間下隅見，擇善而從。至於評論考證，與句讀無關者，溝而去之，勿淆體例」，遂撰成《史讀考異》。¹¹⁴

張綱對於閱讀書籍，尤其是研讀史書時，講究句讀、考證、校勘，繼而擇優而取的習慣某種程度受到了清代學者俞樾¹¹⁵（1821-1907）的影響。俞樾有言曰：「治經由三要。首要正句讀，次要審字義，三要通假借。」張綱深受啟發，並覺得治經如此，治史亦是如此，並付諸於自身閱讀方式上。儒學宗師柳詒徵¹¹⁶（1880-1956）評張綱所著《史讀考異》：「於自來評隙之本。沿訛襲誤者既多所是正。即索隱正義。離句未安。亦援引經子及近儒諸說正之。」¹¹⁷ 對於張綱綜合諸家對《史記》的點評，考訂校正，刪繁就簡，並援引諸家學說觀點的做法，表示極高的肯定。

從中可以得知，張綱採取的不是單一、分散的閱讀方式，而是將閱讀的書籍有系統地相互連結起來。針對閱讀的內容，張綱習慣對各版本進行相互比對，加以勘訂，以求得最完備、最嚴謹的內容。換而言之，張綱處理閱讀過程中接受到的訊息，並不是照單全收式的，而是以嚴謹的態度追根溯源，多方考證，以確保接收文本訊息的正確性。

五、讀物種類

（一）傳統經史子集

作為身處科舉取士的功名社會裡典型士人，張綱在科舉道路上奮鬥了三十多年，是以傳統經史子集是其日常閱讀正課。由於張綱日記始於成年之後，難考其幼時所受科舉訓練和研讀學問的詳細情況。不過張綱曾經任職的詒善祠塾，創辦人孫衣言為該書塾的學徒制定如下十則課約：「一臨法貼，二看經，三看史，四看古文，五看鄉先生遺書，六看時文，七看試貼，八看古賦律詩，九看其他諸書，

¹¹⁴ 張綱著，張鈞孫等編，《杜隱園詩文輯存》，頁404-405。

¹¹⁵ 字蔭甫，自號曲園居士。浙江德清縣人，清末著名文學家、經學家、書法家，被尊稱為「朴學大師」。清道光三十年（1850）進士，曾任翰林院編修。生平所著合集名為《春在堂全書》。

¹¹⁶ 字翼謀，號知非，晚年號劬堂，又號龍蟠迂叟，江蘇省鎮江人。中國近現代史學先驅，中國文化學的奠基人。曾先後執教于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清華大學、北京女子大學、東北大學及中央大學，並擔任南京圖書館館長、考試院委員、江蘇省參議員。

¹¹⁷ 柳詒徵，〈史讀考異序〉，收錄於張鈞孫等編，《杜隱園詩文輯存》，頁524。

十定期文課。」由此可稍窺士子在科舉道路上必做的功課內容，也為瞭解張櫚在傳統經史子集的閱讀世界提供參照。

從日記記錄，諸子百家典籍張櫚皆有涉獵，四書五經六藝等傳統儒家經典常置案頭。正是自幼深受傳統舊籍薰陶，因此張櫚在梁啟超所著的《飲冰室專集》中讀到，梁氏教導清華學生必須講究文言，並強調研讀《史記》、《漢書》、諸子百家及六經、四子書¹¹⁸的做法十分認同。另外梁啟超於《左傳》、《史記》、《資治通鑑》中敘述的諸多戰事皆一一繪圖指點學生，張櫚更是讚賞其「教授有法」。當然，張櫚對於梁啟超不排斥白話文的做法則不甚認同，認為梁氏太過趨時，有意迎合學生。¹¹⁹

早年致力科考所受教育，對張櫚影響之深刻，以至於科舉廢除數年後，其每每翻閱八股文章仍覺回味無窮。民國四年（1915）三月十五日，張櫚讀八股文章彙編《江漢炳靈集》¹²⁰和《管周合稿》¹²¹，感慨「按科舉之廢，距今十餘年，時文舊調，久不彈矣，近取而閱之，猶覺其味醞醞然，若與今之新學家言之，比且擲揄不置。」¹²²民國六年（1917）十月廿四日，張櫚讀沈少潭選編《目耕齋文》，並言：「科舉廢，帖括除，今溫八股幾如舊友重逢，其詮發聖言包孕諸史之作，亦不廢江河萬古流也。」¹²³民國十三年（1924）十二月四日，張櫚重溫《江漢炳靈集》，感慨八股文字已鮮有人讀之，後生少年更是不知其為何，無怪乎視其為無用之物。回想自身困於科場數十年，終究未能得志，張櫚乃歎「予老矣，今取而讀之，猶覺青燈有味似兒時也。」¹²⁴

由於自幼喜好歷史，除上文提及刻苦研讀《史記》，並著有《史讀考異》外，張櫚於正史、歷代紀事本末及各家史論，皆廣泛搜羅，校對研讀，加以品評。譬如其在日記中提到：《南天痕》「是書紀明季事頗具有史筆，較《南疆繹史》大有繁簡之別」¹²⁵；《續明史紀事本末》「敘事頗極意尚簡，讚語亦用駢語，似上承谷

¹¹⁸ 梁啟超以《詩》《書》《禮》《樂》《易》《春秋》為六經，《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為四子書。

¹¹⁹ 張櫚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櫚日記（第九冊）》，頁4379。

¹²⁰ 晚清名臣張之洞（1837-1909）任湖北學政之時，命人將湖北各府科考生員所作八股文章彙編而成，並親自撰序。

¹²¹ 清朝官員管世銘（1738-1798）與周景益的文章合集。

¹²² 張櫚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櫚日記（第四冊）》，頁1548。

¹²³ 張櫚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櫚日記（第四冊）》，頁2002。

¹²⁴ 張櫚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櫚日記（第五冊）》，頁2857。

¹²⁵ 張櫚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櫚日記（第三冊）》，頁1461。

氏體裁，惟間有局促未暢之意，較之谷氏《明本末》稍遜一籌也」¹²⁶。

詩詞文集亦是張桐閱讀興趣所至，且其精於詩文，對於歷代詩詞文集的研讀，必是細心揣摩謀篇佈局及遣詞造句，並品評各家之長短優劣。譬如，點評樊增祥（1846-1931）《樊樊山詩集》：「樊山力尚工巧，又喜疊韻，近日海內皆推為詩家，然刻意求新，誇多鬥靡，反入纖仄一派，於名大家，格高氣渾，自在流行者，恐尤未達一間也。」¹²⁷品評袁枚（1716-1798）的《小倉山詩集》，「於七律一道，機神遊走，筆能達難顯之情，而皆有真意貫注期間，洵為天分絕頂人吐屬。至於七古、五古排律，雖有才氣，然未免近於粗獷，以視漁洋之志和音雅，則迴不侔矣。」¹²⁸

此外《唐宋八大家文》、《古文辭類纂》、《名文珠璣》等文選常置案頭，歷代名儒文集亦時時研讀，細細揣摩，並提出自己的見解。如張桐讀《海峰先生文集》¹²⁹，言「海峰文頗有奇氣，其贈序諸篇，較震川尤佳。以視其師望溪文精實似遜之，宕逸則為過之也」¹³⁰，「理精詞卓，是深有得於莊、列、韓、荀諸子者，雖望溪猶當避之，更何論姬傳乎。」¹³¹又將其與弟子姚鼐的《惜抱軒文集》相較，「按惜抱文神韻尚可，然無勁達之氣，精確之理，實遠不及其師劉海峰。」¹³²讀戴表元（1244-1310）所著《剡源集》，「按先生文甚純雅樸茂，具有八家風格，較明初唐、歸諸家似乎稍勝，而近人談古文辭者多不及之。」¹³³誇讚毛奇齡（1623-1716）的《西河合集》，「先生文駢體上追漢、魏，散文亦不受八家範圍，其敘事簡古處，頗尚班、馬史筆，信開國之手也。」¹³⁴

（二）鄉邦文獻

宋室南流，甌學始盛。陳、葉諸子，心期王佐，純乎永康，實於新安。……
閩黨橫行，百家畔降，而甌學亦絕矣。國朝右文，鴻儒稍出。甌僻人荒，
吾師孫太僕（孫衣言）、學士（孫鏘鳴）兄弟，始表章鄉哲遺書，勉英紹

¹²⁶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三冊）》，頁1637。

¹²⁷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三冊）》，頁1416。

¹²⁸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四冊）》，頁1549。

¹²⁹ 清代詩人、古文家劉大櫟（1698-1780）所著文章合集。

¹³⁰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五冊）》，頁2327。

¹³¹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五冊）》，頁2328。

¹³²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五冊）》，頁2329。

¹³³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一冊）》，頁452。

¹³⁴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三冊）》，頁1515。

緒，甌學複振。¹³⁵

在南宋孝宗乾道、淳熙年間，學術繁榮、學派林立，人才輩出，溫州尤盛。有道是「溫多士，東南為最。」¹³⁶在永嘉眾多學者中，前有鄭伯熊¹³⁷（1124-1181）、薛季宣¹³⁸（1124-1173）等人一脈相承，後有葉適¹³⁹（1150-1223）集前輩之大成，乃形成以「見之於事功」、「以利和義」為中心思想的永嘉學派，與朱熹（1130-1200）的理學、陸九淵（1139-1193）的心學鼎足抗衡。在南宋學術史，乃至中國古代思想史上都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惜宋元之際，永嘉學派日趨衰落。直至清同治年間，由孫詒讓父子的倡導下，黃體芳、黃溯初、劉紹寬等眾多文人名士參與，溫州掀起了搜集整理鄉邦文獻的文化運動，溫州鄉賢譯著得以整理刊印，是為溫州文化史上的一個里程碑。¹⁴⁰

深受地域文化的薰陶，加之日常往來交友多為地方讀書士人，張綱兼具了濃烈的鄉賢意識和振興地方文化的使命感。張綱本身即撰有《溫州風俗記》、《甌海形勢論》，並輯有《卓忠毅遺稿》、《黃漱蘭先生賦鈔》、《梓鄉耆舊文鈔》等，現存於溫州市圖書館中。鄉賢著作亦為張綱日常收藏、閱讀的對象。譬如，張綱稱贊項霽¹⁴¹（1789-1841）的《且甌集》「氣味醇厚，格律縝密」，並視項霽與孫衣言為瑞安詩人中「卓然樹立者」。¹⁴²張綱閱《瑤硯齋詩鈔》：「方先生為我邑道、咸間名孝廉，精於校勘，一字不苟，真有顧礪濱之風。惜其詩所刊太少，文集則未見也。」¹⁴³張綱評王夢篆（1738-1819）《窺園詩鈔》「其詩序二篇均梁山舟作，且摹刻山舟親筆，精彩奕奕，可寶也。」¹⁴⁴亦在日記中稱贊《瑞安百詠》「網羅耆

¹³⁵ 宋恕著，胡珠生編，《宋恕集（上）》（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238-239。

¹³⁶ 參見《宋元學案》卷74《慈湖學案·徐鳳傳》。

¹³⁷ 字景望，浙江永嘉人。南宋紹興十五年（1145）進士，曾任國子監丞、著作佐郎兼太子侍讀、婺州知州、甯國知府等職。著有《鄭景望集》、《鄭敷文書說》等。

¹³⁸ 字士龍，號艮齋，浙江永嘉人。南宋哲學家，永嘉學派創始人。著有《浪語集》、《書古文訓》等。

¹³⁹ 字正則，號水心居士，浙江永嘉人。南宋思想家、文學家、政論家。淳熙五年（1178）中榜眼。歷官平江府觀察推官、太學博士、尚書左選郎、國子司業、知泉州、兵部侍郎等職。著有《水心先生文集》、《水心別集》、《習學記言》等。

¹⁴⁰ 參見：俞雄，〈清末民國間溫州鄉邦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學刊》期5（長春，2000），頁1-6。

¹⁴¹ 字叔明，號雁湖，浙江瑞安人。少年童生應試不利，即棄科舉業，博覽群書，專工詩文。關心鄉里義舉，重視家塾文化，課業弟姪得法。平生喜愛遊山玩水，為詩歌記之。

¹⁴² 張綱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綱日記（第三冊）》，頁1470。

¹⁴³ 張綱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綱日記（第三冊）》，頁1491。

¹⁴⁴ 張綱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綱日記（第三冊）》，頁1461。

獻，補缺拾遺，有功於文獻者不淺，讀之令人增無限見識。」¹⁴⁵

不僅廣閱詩詞總集，張桐對文集亦廣泛涉獵。張桐言葉適的《水心文集》中「墓誌銘諸篇有極用意處，其卓煉不減韓、歐、王三家，故孫太朴評本極賞之」¹⁴⁶，又稱讚其詩「品格句調均高渾不落宋人窠臼。」¹⁴⁷閱讀薛季宣的《浪語集》，張桐誇讚「薛氏年僅四十，而著作宏富，議論皆有見地，似較陳、葉兩家有過之無不及。信乎永嘉經制之學為可貴也。」¹⁴⁸張桐點評孫鏘鳴的《海日樓遺稿》「先生文極有沖融恬雅，簡潔不支之致」，且認為其文雖與孫衣言的意境微有不同，但皆屬桐城派¹⁴⁹的代表。¹⁵⁰對於孫孟晉所輯《溫州民族抗清事》中，鄒欽堯¹⁵¹（1618-1644）的《別父書》、葉尚皋¹⁵²（1607-1647）的《哭廟文》，張桐認為「悲痛淋漓，足為史道鄰、張蒼水兩公之文相輝映。」¹⁵³

於張桐而言，從先賢的詩詞文集中可汲取養分涵養情操，他們學術、事功亦是砥礪鞭策自己的精神動力。另外，秉承著讀書和治學的嚴謹態度，張桐在閱讀地方文獻時皆多方搜集，用心輯錄，細緻考訂。如張桐從洪邁（1123-1202）所著文言志怪集《夷堅志》中讀到有關浙江溫州、台州、處州三府相關的記錄，便覺得可摘錄補充《甌乘拾遺》¹⁵⁴的缺漏。¹⁵⁵《小腆紀年》中記有鄭成功於順治十四年（1657）攻打溫州，張桐讀之發現與《瑞安縣誌》中所記「順治十五年五月海寇鄭國勝攻溫州、瑞安，屯兵於萬松山」，兩個時間先後相隔一年，認為必有一誤。¹⁵⁶張桐讀《永嘉外集》中《義犬記》「詳記江心寺惡僧謀殺一家七命，賴犬

¹⁴⁵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四冊）》，頁1773。

¹⁴⁶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九冊）》，頁4413。

¹⁴⁷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七冊）》，頁3127。

¹⁴⁸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七冊）》，頁3351。

¹⁴⁹ 清代文壇上最大的散文流派。桐城派提倡學習先秦、兩漢及唐宋八大家散文。講究「義法」，主張「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並重。要求語言雅潔，文以載道。是清代極有影響的散文流派。

¹⁵⁰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八冊）》，頁3795。

¹⁵¹ 字維則，瑞安县庠生，徙居永嘉。明末甲申政變之時，作書別其父，自沉永寧江而死。

¹⁵² 字而栗，浙江永嘉人，郡庠生。順治三年，清兵入溫州，葉尚皋披髮歌泣於市。後被捕入獄，吟詠而死。

¹⁵³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九冊）》，頁4494。史道鄰即史可法（1602-1645），張蒼水即張煌言（1620-1664），二人均系明末抗清名將。

¹⁵⁴ 溫州地方誌書，由瑞安人洪守一、洪瀾父子編纂。全書分山川、祠祀、學校、水利、物產、職官、人物、古跡、塚墓、寺觀、仙釋、經籍、藝文、祥異、雜記、續增等門，所補內容止于道光朝，多為齊召南（1703-1768）所纂乾隆年間《溫州府志》所不具。

¹⁵⁵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五冊）》，頁2085。

¹⁵⁶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七冊）》，頁3346。

聲冤事」，即想到要翻閱《溫州郡志》查考是否有記載。¹⁵⁷這種探索求知的態度貫穿了張櫚的閱讀實踐。

《溫州府志》、《東甌金史志》、《永嘉縣誌》、《瑞安縣誌》等地方誌書，張櫚百讀不厭，專述地方掌故軼聞的書籍在日記中更提及不少：女婿葉墨山曾寄《貓苑》一冊，「是書系永嘉黃漢輯，於貓事頗薈萃宏富，板存郭博古齋中，某年博古齋不戒於火，此板亦付之灰燼，今無重刊者，是亦吾甌僅有之秘也」，然而「抄輯貓事頗多，惜說理由處甚少。蓋中國博物之書，大抵如此，所以不若西書之務實也。」¹⁵⁸《甌乘拾遺》「是書系瑞安姻丈洪貫之先生手冊，頗詳略得中，較孫同元之《永嘉聞見錄》似有過之，至孟錦城《永嘉軼事》一書亦佳，惜外間少見傳本，而從葉雨琴先生處得之，亦足備吾甌掌故也。」¹⁵⁹

正因張櫚收藏地方文獻之豐富，是以清末民初黃群等人在整理《敬鄉樓叢書》時，於李維樾（?-1654）《諫垣奏議》、孫詒讓《溫州經籍志》「嘗廣求之，卒不可得」，後悉知「瑞安張振軒先生櫚藏有抄本文一十八篇」，乃向其借得抄之。¹⁶⁰張櫚亦評《溫州經籍志》「中間考證文獻，引據淵而博，裨補後之有志於鄉國掌故者不少。」¹⁶¹不僅如此，張櫚亦曾擔任浙江省志採訪員、瑞安縣誌籌備委員及採訪員，在地方文獻的彙整工作中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貢獻。

（三）報刊雜誌

張櫚從光緒十四年（1888）開始寫日記起就有關於訂閱《申報》的相關記錄。《申報》於1872年在上海發行，次年在杭州設立了分銷處，之後又相繼有寧波、蘇州、南京、揚州等地的分銷處成立，銷售地點主要以江南一帶為主，但不局限於上海，而是積極向外埠拓展，使《申報》的銷量迅速增加。¹⁶²雖然1888年以前張櫚報刊雜誌的閱讀經歷並無記錄，但可看出張櫚受時勢所趨、世風所染，接觸新式媒體的時間尚不算遲。張櫚是在何種因緣際會之下接觸報刊雜誌，詳細情形無從得知。不過，張櫚友人孫詒讓就溫州時人購閱報刊的情況曾言：

¹⁵⁷ 張櫚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櫚日記（第七冊）》，頁3350。

¹⁵⁸ 張櫚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櫚日記（第三冊）》，頁1178。

¹⁵⁹ 張櫚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櫚日記（第九冊）》，頁4280。

¹⁶⁰ 俞雄，〈清末民國間溫州鄉邦文獻的整理與研究〉，頁4。

¹⁶¹ 張櫚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櫚日記（第九冊）》，頁4213。

¹⁶² 李仁淵，《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份子——以報刊出版為中心的討論》，（台北：稻鄉出版社，2005），頁65-67。

敝里閱報之人，第率稔知其人。蓋慨時事之危迫，愛玩欽服者十之一二，而聞有科舉變法之說，假此揣摩為場屋裏挾之冊者，十之七八，其真能潛研討以究中西治亂、強弱之故者，無一也。¹⁶³

可知，時人閱讀報刊與清末科舉考試的改革實有密切的關聯。1902年，清政府正式廢八股、改策論，所考題目的內容涉及時政。當時報刊行業為適應讀者需要，對於科考頗為重視，常刊載時文典範供士子揣摩，有道是「主事者以報紙為藍本，而命題不外乎是；應試者以報紙為兔園冊子，而服習不外乎是。」¹⁶⁴故張綱閱讀報刊除了自身好學求知、關心世事的因素外，多半也可能因為此舉有利於他在科舉道路上獲得成功。

實際上，清末報刊對科舉的積極態度是為吸引士人階層而有意為之的做法。因為作為知識階層的士人，他們在地方社會具有重要的影響力，且對價值觀的形成又關鍵的重要，是以成為傳播媒體爭取的對象，因此報刊業經營者便採取士人最感興趣的話題來打動他們。例如《申報》為吸引文人讀者，就在每次科舉放榜之際，第一時間刊登中舉的名單，甚至延請科甲名士，在放榜之前亦闡題作文等於報首來代替論說，吸引熱衷於功名的士人。¹⁶⁵如此一來形成了「此則報紙之用，本不在科舉之末政，而影響反中於是。」¹⁶⁶

然而迨至科舉廢除，甚至之後清廷結束統治，張綱仍舊保持早年間養成的對報刊雜誌的閱讀興趣。其閱讀報刊雜誌的範圍十分廣泛，既有《申報》、《亞東公報》、《知新報》、《時務報》、《湘學報》、《中外日報》、《萬國公報》、《新聞報》、《時事新報》、《時報》、《東南日報》、《大美晚報》、《新青年》、《教育雜誌》、《甲寅週刊》等全國性的報刊雜誌，亦有《全浙公報》、《浙江新聞》、《浙甌日報》、《杭州國民日報》、《杭州新聞報》、《溫州新聞報》、《溫州日報》、《瑞安新聞報》、《瑞安新報》、《晶報》等地方性的報刊雜誌。

此時閱讀報刊雜誌于張綱而言，不再只是為了科考的需要，而是側重於獲取時局資訊、與外界建立連結。張綱晚年時，其三子、四子分別在南京、杭州任職，

¹⁶³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劄（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1472。

¹⁶⁴ 羅志田，〈科舉制的廢除與四民社會的解體——一個內地鄉紳眼中的近代社會變遷〉，《清華學報》，卷25期4（1995年），頁355。

¹⁶⁵ 李仁淵，《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份子——以報刊出版為中心的討論》，頁74-76。

¹⁶⁶ 姚公鶴，《上海閒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頁131。

期間亦曾寄回《勇士報》、《戰士報》等各類小報，以及《浙江教育月刊》、《前途》、《浙江圖書館月刊》等雜誌，¹⁶⁷擴寬了張桐報刊雜誌的閱讀渠道。

張桐模仿魏源《經世文編》的體例並稍加變通，將《申報》、《滬報》各報輯成四十八冊，並將《新民報》、《大陸報》、《浙江潮》、《新小說》各種合訂為《叢報類編》，共計百餘冊，另有《東方雜誌》、《同文報》、《國粹報》、《政藝通報》及朝章、邸報數百冊或分類或編年，悉數裝訂成冊。¹⁶⁸張桐自言：「雖不敢於庫藏檔冊頡頏，然匯而攬之，頗可為近治國聞者要刪焉。」¹⁶⁹報刊雜誌於張桐而言除了掌握時局動態、瞭解時政要聞，也是其日常消閒娛樂的讀物。譬如張桐以閱讀《三日畫報》、《遊戲雜誌》、《消閒報》、《宇宙風》等作茶餘飯後消遣之具。另外學術專刊如《國粹學報》、《國風報》、《學衡》、《國學季刊》、《國學叢刊》、《教與學》、《史學專刊》、《史地叢刊》也是酷好文史的張桐時時翻閱的讀物。

廣泛閱讀報刊雜誌的經驗使張桐對於時人發行的報刊雜誌的品質自有評判標準。張桐在日記中提到，報刊的優劣主要取決於兩個方面，一是內容素材，二是印刷工具。他曾抱怨「甌郡商業雖微，何區區鉛字活板不能置辦一副好者，以致報章雖有幾種，然無一可以娛目者，半由材料之荒，亦半由板子之劣」，並言「工欲善事，必先利器」，「願有辦報者，尚其於『器』字加意，則報界自然發達，否則有覆轍相尋而已。」¹⁷⁰針對地方報刊業的發展，張桐提出了自己的一番見解，並希冀從業者能重視印刷工具，以繁榮當地的報刊業。

張桐對於報刊雜誌所刊內容的評價在日記當中亦悉數呈現。張桐曾言《國風報》「是報系上海廣知書局出版，其別號滄江者筆墨最多，皆關係近時政論，精切不膚，益人智識。」¹⁷¹評《遊戲雜誌》「分文苑、譚叢、小說、傳奇、雜俎諸門，詞料頗見豐富，與初學者看，極浚發心思，較之繆蓮仙《文章遊戲》，則又推陳出新矣。」¹⁷²張桐初讀《晶報》時提到「此報主筆系張丹翁，不知為何處人，其材料大半為遊戲之事」，數日後複讀《晶報》又言「按此報亦上海小報之一種，

¹⁶⁷ 可參見民國十九年十月初十、民國廿一年五月初七、民國廿四年二月十二所記，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八冊）》，頁3559-3560、3689、3941。

¹⁶⁸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十冊）》，頁4661。

¹⁶⁹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十冊）》，頁4661。

¹⁷⁰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四冊）》，頁1864。

¹⁷¹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三冊）》，頁1272。

¹⁷²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三冊）》，頁1402。

中間尚頗有趣味可尋。」¹⁷³可以看出，張綱在閱讀報刊雜誌的時候不是純粹地接受內容，而是互動式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見解。而這些看法與見解也會隨著閱讀的深入發生相應的轉變。

（四）西學/新學書籍

學者潘光哲用「知識倉庫」一詞來描繪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世界。¹⁷⁴身處「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晚清士人，在追求「世界知識」的道路上，建立起包羅萬象的「知識倉庫」，這既是近代中西交流的一部分，也是「西力東漸」的結果之一。

「知識倉庫」的建立與擴張，是晚清士人得以窮究「西學」的閱讀空間，為擴充變易他們的讀書世界，提供無限可能。¹⁷⁵一般士人更因為必須因應如書院考課或是科舉應試等等制度性的要求，終究得改變自己讀書實踐的習慣，邁步踏入「知識倉庫」，親眼目睹期間的奧妙珍寶。¹⁷⁶張綱亦是晚清之際邁步進入「知識倉庫」的眾多士人中的一員。

科考改制鼓勵新舊學兼通，「新酒裝舊瓶」的改革政策是引導士人讀書世界變化的推動力。學者羅志田就以山西舉人劉大鵬（1857-1942）為因應科考請人代買「西學」相關書籍為例對此有所論述。¹⁷⁷羅志田亦提出，各地讀書人在接觸到「西學」書籍的難易程度是不一樣的，「至少內地讀書人與書商所自的口岸讀書人已不在一條起跑線上。」¹⁷⁸劉大鵬生活的山西太原縣赤橋村，是一個相對偏僻封閉的地方。他多次參加會試均未中榜，隱居家鄉，擔任教職，參與地方事務，兼經營煤窯。劉大鵬在科考改革論的次年（1903）到河南開封參加應試，發現在山西還不多見時務書籍，在此地「汗牛充棟，不堪枚舉其名目，凡應會試者，皆到書肆購買時務著書，以備場中查對新法，故書商、書局抬其價，並不賤售。」¹⁷⁹

¹⁷³ 張綱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綱日記（第六冊）》，頁 2933、2935。

¹⁷⁴ 潘光哲，〈追索晚清閱讀史的一些想法——「知識倉庫」、「思想資源」與「概念變遷」〉，《新史學》，卷 16 期 3（2005 年），頁 137-170。

¹⁷⁵ 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1833-1898）》，頁 49-65。

¹⁷⁶ 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1833-1898）》，頁 17。

¹⁷⁷ 羅志田，〈科舉制的廢除與四民社會的解體——一個內地鄉紳眼中的近代社會變遷〉，《清華學報》卷 25 期 4（新北，1995），頁 354。

¹⁷⁸ 羅志田，〈科舉制的廢除與四民社會的解體——一個內地鄉紳眼中的近代社會變遷〉，頁 355。

¹⁷⁹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頁 121、609，轉引自羅志田，〈科舉制的廢除與四民社會的解體——一個內地鄉紳眼中的近代社會變遷〉，頁 355。

相較於劉大鵬家鄉「僻處偏隅」¹⁸⁰難以購買「新學」書籍，那麼身處東南沿海通商口岸的張桐則要幸運得多。張桐日記中最早提到閱讀「新學」書籍的記錄是，光緒二十二年（1896）五月十七日，早晨看鄭觀應¹⁸¹（1842-1921）所著《盛世危言》，並認為此書「頗有言中肯綮處」。¹⁸²簡短的點評可以看出張桐對「新學」的態度至少並不排斥。此後他亦隔三差五閱讀此書。同年九月，張桐又陸續購閱《洋務實學》、《海國圖志》、《中東戰事本末》、《洋務實學新編》、《中日戰紀》、《中日戰輯》等。¹⁸³次年三月，張桐購買了《西學書目表》，¹⁸⁴此舉或可表明張桐有意瞭解更多西學相關之著作。五月，張桐在日記提到《西學富強叢書》為「泰西名家所著之書選其善英，去其糟粕，莫不圖繪臻備，考編精深。」¹⁸⁵

此後張桐又相繼購閱《無邪堂答問》、《勸學編》、《續富國策》、《泰西新史攬要》、《原富》、《天演論》、《環球地球新錄》、《衛生學問答》、《交合論》、《普法戰紀》、《日本地圖冊》、《維新史》、《萬國歷史》、《世界地理》、《女子教育》、《中國魂》、《現今大勢論》、《將來大勢論》、《男女育兒》、《強聒策論》、《男女衛生學》、《衛生學教科書》等。¹⁸⁶並曾與友人借閱《西學大成》、《保華全書》、《男女衛生造化新機論》、《普通妊娠論》、《男女婚姻衛生學》等。¹⁸⁷

在張桐閱讀的一眾「新學」書籍裡，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衛生書籍的出現。張桐於日記中曾記：「按《造化新機論》為日本醫士武藤忠水著，《普通妊娠論》為日本渡邊光次著。二書論男女生育之理，精闢絕倫，纖維畢具。而所繪陰陽胎孕之圖，尤精妙無匹。惜字多東文，未通東語，閱之殊多隔耳膜。」¹⁸⁸雖不通日文，但張桐亦覺得書中所論、所繪頗精彩翔實。又有「新出《男女婚姻衛生學》，是書又名《少年男女須知》，乃為日本女醫士松本安子所著，議論深精，包羅廣闊」，所言內容「少年大半事業皆在於此，吾人一讀之，當知應如何養生，如何結婚，

¹⁸⁰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頁20。

¹⁸¹ 字正翔，號陶齋，別號杞憂生，廣東香山人。近代思想家、實業家、教育家。先後在英商寶順洋行、太古輪船公司任買辦。歷任上海電報局總辦，輪船招商局幫辦、總辦。

¹⁸²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一冊）》，頁283。張桐在日記中稱作者為鄭觀陶，按《盛世危言》作者為鄭觀應，號陶齋，此處殆系其筆誤。

¹⁸³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一冊）》，頁303-304、309。

¹⁸⁴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一冊）》，頁337。

¹⁸⁵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一冊）》，頁344。

¹⁸⁶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一冊）》，頁424；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二冊）》，頁667、669、780-781、810-811、813、879。

¹⁸⁷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二冊）》，頁524、696。

¹⁸⁸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二冊）》，頁696。

如何生子，如何養育，誠渡世之寶筏也。」¹⁸⁹

無獨有偶，似張桐閱讀此類衛生書籍並不是個例，時人孫寶瑄¹⁹⁰（1874-1924）同樣也是衛生書籍的讀者之一。學者張仲民認為，孫寶瑄之所以閱讀此類書籍，是出於對中國種族問題的憂慮以及對改良傳種問題的關注，期待中國人能與白種人結合，以產生新種族，擺脫被列強輕視的「劣種」狀態。¹⁹¹或可推知，張桐對於衛生書籍的閱讀也是出於「強種強國」的關懷。另外，此類書籍成為傳統士人的讀物，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出社會觀念在潛移默化的發生變化，國民思想更加的開化。

另外，張桐對於「新學」書籍的態度是可以從日記中的評價看出的。如日記中載有，《保華全書》「是書為英國議院大臣貝思福著。其遊歷中國各省，查察商務利弊，兼討論水陸兵備，其精到處，真切中中國近日癥結也。又遊日本、美國，述其商務之盛，兵力之強，令人有穆然興王氣象。」¹⁹²《西史綱目》「是書薈萃近日言西學之書，而加以論斷，棄取亦頗有識，惟上古至漢止，其餘尚俟續出，亦近日講時務者，不可不備之書。」¹⁹³《訓蒙地理志》「書條理不及《地理問答》之明晰，而圖畫詳明，則較《問答》為優，亦課蒙之佳本也。」¹⁹⁴《日本國志》「內容議論精透，綜覽五洲大勢，不為一隅之見。雖志在日本，抑豈為日本志哉。」¹⁹⁵綜上所述，張桐對於「新學」書籍的接受程度還是比較高的，而且頗具讚賞之語。

光緒三十三年（1907），在瑞安中學堂任職史地教員期間，出於教學所需，日常閱讀所涉「新學」書籍頗多。元月廿一日，張桐權衡對比各種西史，但都覺得「蕪雜欠要，殊不足為講堂之用」，遂「開列應用之書，如《歐洲戰紀本末》《西史通釋》請本堂寄滬另買。」¹⁹⁶未過幾日，孫詒讓與胡友松來找張桐商酌教科書之事宜，張桐告訴他們「西史、地理兩門均少善本，無已則唯取《萬國演義》

¹⁸⁹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二冊）》，頁 783。

¹⁹⁰ 字仲璵，浙江錢塘人。曾先後任工部、郵傳部、大理院等職。雖然功名不顯，但是學問涉獵甚廣。著有《忘山廬日記》、《日益齋日記》、《忘山廬詩存》等。

¹⁹¹ 張仲民，《種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閱讀文化與接受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頁 112。

¹⁹²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二冊）》，頁 697。

¹⁹³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二冊）》，頁 769。

¹⁹⁴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二冊）》，頁 770。

¹⁹⁵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二冊）》，頁 783。

¹⁹⁶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二冊）》，頁 946。

為西史教科，《中國輿地大勢論》為地理教科而已。」¹⁹⁷次日，張櫚閱《地文教科書》及《地文圖表》，且「將二書參輯手抄，為明日甲班生上課之本。」¹⁹⁸

此外，張櫚亦閱有《世界近世史》、《地球十五大戰紀》、《政治史》、《十九世紀外交史》、《歐洲十九世紀史》、《斐洲遊記》、《萬國演義》、《法國志略》、《萬國指掌形勢圖》、《支那疆域沿革地圖》、《西史列傳》、《日本先覺志》、《維新慷慨史》、《歐洲八大帝王傳》等。¹⁹⁹以上皆出於備課教授學生之需，也可看出其對待教職的認真態度。

學者羅志田認為科舉改革對於維持「正學」的士人是沉重的打擊，不僅讀書仕進之途已尊西學，即使謀教為生，也是「凡能外洋各國語言文字者，即命為學堂教習，束脩極厚。」²⁰⁰此時於講舊學者尚有一絲選擇餘地，待科舉一廢，不會新學的士人就只能失館，那就不僅僅是束脩厚薄的問題了。²⁰¹而從張櫚的案例可以看出，在面對時局政策的變化，自幼接受傳統儒學教育的張櫚懂得積極應對，適時轉變，為自身的轉型做出了相應的努力。後來因在瑞安中學堂受到不公平的對待，張櫚於是年底辭去教員一職。並於次年受邀之瑞安中學堂擔任歷史教員。此後張櫚的閱讀世界裡「新學」書籍的比例明顯下降，閱讀所及也多以早年購入「新學」書籍為主，鮮有購閱新書的記錄。

（五）小說讀本

對於經史子集等正課學問細心研讀的同時，並不妨礙張櫚對消閒娛情讀物的喜好，小說讀本亦是其日常案頭常備之讀物。傳統通俗小說，如《西遊記》、《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封神演義》、《七俠五義》、《聊齋志異》等自不必說。清末之際，在西學/新學的影響下，此類大眾讀物被視為應當禁止的「淫辭小說」，小說的社會功能與政治作用也被上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維新人士遂以「真國民精神、開國民智識」為標榜，創作推行新小說、翻譯外文小說，以期改造大眾閱讀文化。²⁰²在此情形之下，新小說的創作、外文小說的譯介，蔚然大觀，

¹⁹⁷ 張櫚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櫚日記（第二冊）》，頁 949。

¹⁹⁸ 張櫚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櫚日記（第二冊）》，頁 949。

¹⁹⁹ 張櫚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櫚日記（第二冊）》，頁 947、949、951、955-956。

²⁰⁰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126 頁，轉引自羅志田，〈科舉制的廢除與四民社會的解體——一個內地鄉紳眼中的近代社會變遷〉，頁 356。

²⁰¹ 羅志田，〈科舉制的廢除與四民社會的解體——一個內地鄉紳眼中的近代社會變遷〉，頁 356。

²⁰² 相關研究可參見：張仲民，《種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閱讀文化與接受政治》，頁 30-49。

所涉類別有冒險小說、復仇小說、寓言小說、情感小說、社會小說、偵探小說等。另外各小說類刊物接踵而來，甚至於報紙雜誌也開始刊載新小說。張桐在日記中便提到《小說界》、《小說林》、《小說海》、《小說新報》、《小說畫報》、《小說大觀》、《小說月報》等。

作為趨新人士的張桐，對新小說的閱讀自然是樂此不疲。譬如在其日記中有多處提到閱讀外文小說譯著的記錄：法國文豪葛爾所著《鐵窗紅淚記》「以蒙莊之筆，寫哀慘之情，一轉一意，體會入微，真說理之奇文，中國無此鴻著也。」²⁰³《黑奴籲天記》「雖是西人小說，然描摹神氣，歌泣淋漓，不減曹雪芹《石頭記》，而其語含隱諷，激動國恥，亦是一篇大文章，不得與小說家等量奇觀也。」²⁰⁴英國小說《帳中說法》「敘一婦人詬誶其夫，娓娓瑣屑，口角如生。全書約四萬餘言，亦說部中之別開生面者。」²⁰⁵英國小說《魯濱孫漂流記》「是書描寫魯濱孫陷於絕島二十八九年，竟能自創基業，制服野蠻，得船回國，其一種耐苦堅忍之心，較舜居深山，禹治洪水尤倍之，讀之真令人氣壯神旺。」²⁰⁶此外張桐曾讀英國小說《埃及金塔剖屍記》、法蘭西小說《火山報仇錄》、法蘭西小說《懺情記》、美國小說《暗殺案》等。

雖說張桐閱讀小說是作消遣娛樂，但也不忘加以闡述點評。如日記所提及：《孽海花》²⁰⁷「是說部之佳作構，中間全描寫洪文卿星使寵妓出醜，並關涉西國虛無黨中國變新法諸歷史，不可徒作說部書讀也。」²⁰⁸甚至之後與好友張文伯在飲酒間談及《孽海花》，亦覺津津有味。²⁰⁹《海上繁花夢》²¹⁰「是書描寫上洋蕩子情狀，喚醒癡迷幻相，真藥石箴規之言，不得以尋常小說家目之也。」²¹¹《彭公

²⁰³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三冊）》，頁1178。

²⁰⁴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二冊）》，頁768。

²⁰⁵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四冊）》，頁1553。

²⁰⁶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七冊）》，頁3177-3178。

²⁰⁷ 《孽海花》是清末民初金松岑（1874-1947）、曾樸（1872-1935）創作的長篇譴責小說。以蘇州狀元金鈞和名妓傅彩雲的經歷為線索，展現了同治初年至甲午戰爭三十年中國社會政治文化生活的歷史變遷。

²⁰⁸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二冊）》，頁1026。

²⁰⁹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三冊）》，頁1052。

²¹⁰ 《海上繁華夢》是清末民初孫玉聲（1864-1940）所著狹邪小說。取材於十里洋場的上海晚清時期的社會生活，它以描寫妓院、賭館為中心，比較真實地反映了當時封建階級、買辦勢力在半殖民地的上海灘狂嫖濫賭的惡習，揭露了娼妓、嫖客、賭徒之間形形色色的欺騙、敲詐、坑害的卑劣行徑。

²¹¹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三冊）》，頁1088。

案》²¹²「是書借康熙年間彭鵬事敷衍成書，四集計有三百餘回，可謂多矣。然不脫《七俠五義》窠臼，純道綠林行徑，閱之令人生厭。」²¹³但讀完全集後，張桐的觀點出現了變化，認為其中部分情節「饒有如茶如火之觀，足以破睡魔而消暇日也。」²¹⁴《西洋記》²¹⁵「按是書敘明三寶太監下西洋取寶事，中極怪誕，較之《西游》《封神》有過之無不及，然亦說部中神怪之一種也。」²¹⁶《俠鳳奇緣》²¹⁷「是書落想新穎，構局離奇。於《紅樓夢》《花月痕》《碎琴樓》《玉梨魂》諸書外，又別出一帙，可稱小說界之特色矣。」²¹⁸

張桐不僅自己喜歡閱讀小說讀本，還樂於將這些故事講給家人聽。光緒二十三年（1897）五月十三日，「晚說《水滸傳》為內子諸兒女聽，約至三更後方睡。」²¹⁹光緒三十二年（1906）四月廿二，「燈下說《聊齋志異》數則與諸女兒聽。」²²⁰光緒三十四年（1908）三月初九，張桐在府前街日新書局購買《天方夜譚》四冊。²²¹十九日，旋即說與內子及女兒聽。²²²民國三年（1914）閏五月十三日，「看《小說界》及《挑燈新語》，因說兩則與林宅岳母聽。」²²³民國五年（1916）正月一日，「燈下說《筆生花》第一回，與林宅岳母及內子、綿女諸人聽，至更餘乃寢。」²²⁴或可說，講述小說讀本成了張桐與家人的一種日常互動方式。

六、結論

綜上所述，我們對於張桐的閱讀生活有了基本的建構。跨越半個世紀的《張

²¹² 《彭公案》是清末貪夢道人所寫長篇公案小說。書中大部份情節實屬虛構，描述了清朝康熙年間的循吏彭鵬在江湖豪俠的幫助下，如何懲治貪官惡霸、綠林草寇的故事。前部側重描寫彭公斷案，後部則是江湖恩怨。

²¹³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三冊）》，頁1461。

²¹⁴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三冊）》，頁1467。

²¹⁵ 《西洋記》全稱《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明代羅懋登所著長篇神魔小說。成書于明萬曆二十五年（1597）。根據鄭和下西洋故事改編而成，全書描寫明代永樂年間鄭和掛印，招兵西征，以王景宏為其副手，共平服三十九國。

²¹⁶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四冊）》，頁1862。

²¹⁷ 清末民初文學家李涵秋(1873-1923)所著章回體小說，它以辛亥革命前後數年為背景，熔愛情與愛國為一爐，集纏綿與俠義於一體，合教化與娛樂為一書。

²¹⁸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五冊）》，頁2348。

²¹⁹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一冊）》，頁344。

²²⁰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二冊）》，頁863。

²²¹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三冊）》，頁1064。

²²²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三冊）》，頁1066。

²²³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三冊）》，頁1439。

²²⁴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四冊）》，頁1704。

《張桐日記》呈現了溫州瑞安一個近代下層士紳豐富且廣博的閱讀世界。誠如張桐自言：「只有詩書餘結習，甜吟蜜詠當餐薇。」²²⁵於張桐而言，閱讀就如同日常衣食住行一般不可缺少。在他的一生當中，閱讀確實也嵌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張桐以各種渠道廣泛獲取讀物，拓寬閱讀範圍，有時甚至節衣縮食購書，亦曾自吟「家有藏書未足貧」。²²⁶出於對閱讀的熱情，張桐更是不拘時空，不論陰晴，時時刻刻以讀書為樂。讀書的場所更不局限於室內場所，即便外出遊玩之際，路途中或目的地都不啻閱讀。

不受限制的閱讀時間和空間反映出張桐對閱讀的喜好程度，從閱讀的方式中可以看到張桐嚴謹的治學態度。張桐廣博的閱讀領域更是涵蓋了多樣的閱讀種類。在張桐豐富的閱讀實踐中，對於讀物的選擇，不僅是出於自身的興趣，還與現實因素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譬如，為了因應科舉考試的轉變他開始接觸報刊雜誌，為了教授課程廣閱「新學」書籍，甚至親自編寫教材，凡此種種的閱讀行為都是在現實需求的觸動之下發生。讀者的閱讀行為是在多重因素的綜合作用下產生的。

正如潘光哲所述：閱讀不但是種技能而已，更還是一道尋求意義的途徑。透過閱讀史的取向，我們可以深入瞭解晚期士人是怎樣借由各式各樣的閱讀/思想活動為他們的生命尋求意義，編織自己的「意義之網」。²²⁷張桐廣泛且蕪雜的閱讀實踐正是其探尋與建構作為士人身份的人生意義之路。

早年間致力科考的經歷，使其深受傳統儒學經典的薰陶，對於經史子集的研讀成為他安身立命的根基，是以閱讀舊籍成為他強化士人的文化認同和角色定位的方式。即便科舉廢除多年後，每當重讀科舉文章，張桐仍覺得回味無窮。如卞東磊所言甲午戰爭以前中國讀書人的社會世界主要聚焦在「前人世界」，他的閱讀實踐處於圍繞儒家學術展開的穩定狀態，缺乏對於現實社會的關懷。直至 1895 年以後，隨著新學書籍、報刊雜誌廣泛出現在他們的閱讀世界，他們的思想觀念也隨之出現轉變。²²⁸

身處新知舊學碰撞的時代背景下，張桐不可避免地受到新學感染的感染。閱讀活動向新學書籍與報刊雜誌的擴展是張桐在時局變動之下，為實現自我轉型做出的

²²⁵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一冊）》，頁 3。

²²⁶ 張桐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桐日記（第一冊）》，頁 3。

²²⁷ 潘光哲，〈追索晚清閱讀史的一些想法——「知識倉庫」、「思想資源」與「概念變遷」〉，頁 160。

²²⁸ 卞冬磊，〈「現實主義的匱乏」：甲午前夕中國讀書人的閱讀生活〉，頁 22-31。

努力與調適。張櫲的閱讀經歷也展示了過渡時代舊學出身的下層士紳廣泛接觸新學的例證，體現了下層士紳群體與新學之間的包容度與契合度。

同時作為地方士紳的張櫲，對於地方文化有著與生俱來的強烈責任感，因此鄉邦文獻與地方掌故亦是他日常閱讀的重點，並且身體力行地參與到了地方誌書的編撰當中，以此凸顯自身在地方文化中的權威地位。在張櫲對於鄉邦文獻的閱讀與整理搜集中，則窺見其在地方文化事業上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另外，各類小說讀本的閱讀則屬於張櫲日常消遣娛樂的重要方式。

張櫲新舊交織兼具地方色彩的閱讀世界，或許不足以代表整個近代下層士紳群體的閱讀世界，但不可否認，其長期且豐富的閱讀實踐為窺探近代下層士紳群體的複雜閱讀歷程提供了可作參考的例證。《張櫲日記》中大量的閱讀記錄是研究個體閱讀生活的絕佳史料，當諸如此類的個案研究集聚到一定數量時，我們才能對時人的閱讀世界有更全面的認知，實現從「以小見小」到「以小見大」的變化。

徵引書目

一、 史料

張櫚著，溫州市圖書館編，《張櫚日記（全十冊）》（北京：中華書局，2019）。

張櫚著，俞雄選編，《張櫚日記》（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張櫚著，張鈞孫等編，《杜隱園詩文輯存》（香港：香港出版社，2005）。

宋恕著，胡珠生編，《宋恕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

梅冷生撰，潘國存編，《溫州文獻叢書之梅冷生集》（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2006）。

姚公鶴，《上海閒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二、 專書

卞東磊，《古典心靈的現實轉向：晚清報刊閱讀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

李仁淵，《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份子：以報刊出版為中心的討論》（台北：稻鄉出版社，2005）。

張仲民，《出版與文化政治：晚清的「衛生」書籍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

張仲民，《種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閱讀文化與接受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1833-1898）》（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014）。

三、 期刊論文

卞冬磊，〈「現實主義的匱乏」：甲午前夕中國讀書人的閱讀生活〉，《河南大學學報》，卷 53 期 6（2013 年），頁 22-31。

尤育號，〈在舊學與新知之間：一個鄉村士紳的閱讀世界——以張櫚《杜隱園日記》為中心〉，《歷史教學問題》，期 4（2011 年），頁 93-100。

徐佳貴，〈廢科舉、興學堂與晚清地方士子——以林駿《頗宜茨室日記》為例的考察〉，《近代史研究》，期 4（2013 年），頁 110-125。

俞雄，〈清末民國間溫州鄉邦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學刊》，期 5（2000 年），頁 1-6。

潘光哲，〈追索晚清閱讀史的一些想法——「知識倉庫」、「思想資源」與「概念變遷」〉，《新史學》，卷 16 期 3（2005 年），頁 137-170。

蔣建國，〈二十世紀鄉紳的報刊閱讀與觀念世界——以張桐、皮錫瑞、劉大鵬為例〉，《高校圖書館工作》，卷 38 期 183（2018 年），頁 65-70。

羅士傑，〈地方宗教傳統與「去中心化」的地方政治：重探溫州金錢會事件（1850-1862）〉，《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75（2012 年），頁 159-202。

羅志田，〈科舉制的廢除與四民社會的解體——一個內地鄉紳眼中的近代社會變遷〉，《清華學報》，卷 25 期 4（1995 年），頁 345-369。

The Reading Life of Lower Gentry in Ruian, Wenzhou from Late Qing Dynasty to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ake “Zhang Gang’s Diary” as an Example

Jing Wu

Abstract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lower-class gentry Zhang Gang (1860-1942) in Ruian, Wenzhou, began to write a diary in the 14th year of Guangxu (1888), and by the 31st yea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42). He leaves a diary that spans more than 50 years for later generations. In recent years, Zhang Gang's diary proofread by his posterity Mr. Zhang Junsun has been published, so we can get a glimpse of the entire volume of diary. The value of Zhang Gang's Diary lies not only in its long recording time, but also in all-encompassing content, covering politics, economy, education, industry, famine, farmland, folklore, and many other aspects in Wenzhou. It i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material for the study of local history. It also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daily life of the lower-class gentry in modern times.

The author of diary Zhang Gang is born in a family of farming and studying. In his early years, he devotes himself to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Zhang Gang, who enjoys reading since he was a child, has a wealth of books at home and writes his personal reading experience in his diary. Because Zhang Gang enjoys reading in daily life, his reading activities are not limited by time and space. He reads whenever he has time, even carries books with him for reading on the road. After looking over the contents of diary, it can be found that Zhang Gang has a wide range of reading types. A collection of classics and histories that traditional scholars must study is no doubt to say. And because he was in the era where old and new ideas are intertwined, books about new knowledge,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are covered in his reading scope. In addition, he also likes reading country literature, novels and so on. After reading, Zhang Gang is used to express his personal feelings and opinions on books, new knowledge

and old studies, and current political affairs. From this, we can se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reading experience and ideas of the lower-class gentry under the turmoil situation and the collision and exchange of different cultures.

Keywords: Zhang Gang's Diary, the world of reading, the lower-class gentry